

责编:王凡
美编:唐龔

删言快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

与萨特、波伏娃、加缪、海德格尔、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梅洛-庞蒂一起，喝香鸡尾酒，聊聊人类最重要的两大问题
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

何以为人？

删乐昊

在1932年和1933年之间，三位年轻的哲学家坐在法国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一边啜饮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一边畅聊着哲学。

“你看，我的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说话者是雷蒙·阿隆，而那两位倾听者，则是他在巴黎高等师范的老同学，萨特与波伏娃，他们三人如此年轻，目光灼灼，都还没满三十岁。当时萨特和波伏娃已经在法国教书，而阿隆却在柏林做研究，他告诉他的两位朋友，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正在成为风潮的哲学，名字朗朗上口：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词，无论是用英语还是法语念出来，都是如此雅致、顿挫，仿佛抑扬格诗句。

阿隆进一步解释道，德国的现象学家，放弃了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的抽象哲学观，开始直接研究起了自己此刻正在经历的生活，并且意识到，在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里，哲学家可以专注于和现象相遇。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命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而现象学的逻辑就是，人们可以抛开智识的杂乱，转而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

波伏娃后来曾在她的写作中再现过当时的场景：萨特听到阿隆的这番话，面色唰地白了。在大学受够刻板哲学训练的萨特正在试图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破坏性的哲学”，他和波伏娃已经读过一些海德格尔，但并未得其奥妙。而阿隆的这番谈话让萨特意识到，这可以是一种新的研究哲学的方式，把哲学和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萨特说，他从未忘记那一刻的感受。在三人谈话后，萨特马上冲到最近的一家书店，对店员喊道：“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

实际上，在“煤气灯”酒吧里的这一刻，亦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端。阿隆建议萨特到柏林学习德语，研究现象学家的原论著作，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正好萨特厌倦了教书，他渴望冒险：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动，去阿托斯山同僧侣一起冥想，以及去纽芬兰岛跟渔民一起抵抗风暴……但现象学的磁力让他去了柏林，并带回来一种新哲学，经他融合了德国现象学与丹麦克尔凯郭尔思想，并点缀以法式文学书写调料的新思潮：现代存在主义。

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便是这样一本结合了历史、传记和哲学的史诗般的作品，为我们再度厘清存在主义在今天仍未过时的魅力所在。

萨特的口号是：存在先于本质。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抛入这个世界，便会自行创造自己的定义，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件始终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通过行动来创造自身，这便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境遇。从人拥有第一缕意识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将其抹去。“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存在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事故迭出的时代：纳粹、屠杀、战争、原子弹爆炸……萨特在文章里不断警醒他的读者：是人类在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毁灭自己以及我们的所有历史，甚至毁灭地球，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够阻止我们。“就这样，他为人类这个刚刚把自己吓了个半死，现在终于准备好长大成人、负起责任的物种，提供了一门量身定制的哲学。”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者已经让位给了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新一代，存在主义也被认为是过时的思潮，但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人们隐隐嗅到多事之秋的气息，存在主义又被再一次召唤。

过去的—个世纪，随着脑科学和人体医学、基因学迅猛发展，我们对人是什么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但同时也越来越迷惑。如果我们受制于神经元和荷尔蒙，其本质不外乎数据与信息，那么何以确认人是自由的？是什么把人和动物、人和非人、人和AI区分开来？人类解决了太多问题，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在一个庞大而不确定的未来面前，重读存在主义，就是再一次反思人之“存在”：何以为人？我们因何在此？人类又要为自己打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匡石译
《林中的陌生人》

我本爱丘山

陆远

同样是林中隐士，亨利·梭罗声闻天下，克里斯多夫·奈特却寂寂无名，不过这并不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不屑一顾——在奈特看来，梭罗实在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隐士”，最多是个“业余爱好者”。在瓦尔登湖边“隐居”的两年零两个月时间里，梭罗常和母亲一起用餐，他还要招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至于把湖畔经历写成一本书，把自己的思想包装成一件商品，更与真隐士应该做的事背道而驰，因为这些举动都是指向外部社会的，仿佛在向世人大喊：“我在这里！”

奈特本人正好相反，1986年春天，20岁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走进离家不远的缅因州中部小镇罗马镇北塘森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在反复考量之后明白了一件事：自己这一辈子只有在独处时才感到舒服，与另外任何一个人见面，都像是一场巨大的冲突，令人沮丧。从那以后，奈特住在荒野中独自生活了将近10000个夜晚。直到2013年4月4日在附近度假营地盗窃食物时被捕，在27年时间里，除了与一位不期而遇的徒步者说了个单词“hello”以外，奈特没有与任何一个人接触，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据事后采访他的记者迈克尔·芬克尔估计，古今中外的隐士们，没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时间超过奈特，他是“整个人类史上已知的最孤单的人”。

芬克尔对隐逸文化素有兴趣，根据他的研究，自人类能够书写以来，就一直记录着隐士的事迹：从心怀种种不满的抗议者到各种类型的宗教隐修者，再到如梭罗那样通过独处找寻艺术的自由、科学的洞见或者“自我”的探求者，每种文明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人寻求避世独居。柏拉图、笛卡尔、克尔凯郭尔、达尔文、爱迪生、勃朗特姐妹、梵高、卡夫卡等等，都曾被视作孤独的隐士，《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说，“所有深刻的事物都是在沉默之后出现的”。然而，奈特和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在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隐居生涯里，他“完全背向这个社会”，没有写下过一句话，用芬克尔的话说，他似乎“超越了所有的界限，一头扎到了那口井的底部，抵达了神秘的内心最深处”。社会学把人视作群居的动物，但奈特的经历似乎给所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出了个难题，也同样让芬克尔既好奇又困惑，基于大量采访、调查和思考，他写成了《林中的陌生人》。

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刚买了部新车，却要抛弃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行为比自杀还要决绝，因为不仅在向世界宣告“我不存在了”，还要时刻克制自己重新成为社会成员的冲动。

一些心理学家倾向于从原生家庭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奈特的父母和睦，兄弟友好，他从没经历过性虐待、家暴或者其他什么童年创伤，奈特也没有性别困惑，更不是为了逃避惩罚。另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奈特本人出现了器质性的病变，比如阿斯伯格综合征(自闭症的一种)、抑郁、分裂型人格障碍或者脑部有异常，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在长期独居生活中，奈特表现出高超的规划与协调生活的能力，他把露营地收拾得整整齐齐，自己也干净体面(尽管27年里他没有洗过一个热水澡)，完全不像一个自闭症或精神分裂患者。

不仅如此，奈特的经历似乎也对长期以来人们笃信的社会生物学说提出挑战。进化心理学和人类学都认为，社会交往与合作是人类物种得以迅速强大的主要原因，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实验也证明，社会生活被长期剥夺，会对大脑产生不可逆转损伤。然而对奈特来说，从离群索居中获得的快乐和慰藉却是无与伦比的，对此，学者们似乎也束手无策。

事实上，遗世独立的圣人也好，精神失常的疯子也罢，奈特的经历并不具备群体代表性，却从另外的角度给人启发——现代世界像一辆脱缰的马车，莽莽撞撞地向前冲去。马车上的每个人，拼尽全力却仍胆战心惊。为了不被甩下车去，我们大半生禁锢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每天消耗在电脑桌前。奈特说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砍伐树木就象征着锐意进取，而每天在林间徜徉就代表消极厌世”。奈特坚持认为，他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意味着逃避，更不是对消费社会无声的批评，只是希望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并不试图“寻找自我”，而是尝试“失去自我”。生活世界里，每个人总戴着一副社交面具，而在森林深处，奈特放弃了所有自欺欺人的花招，他放弃了身份，放弃了名字，甚至没有一面镜子。结果是出人意料：就像爱默生说的那样：我什么也不是，却看见了一切；我谁也不是，却成了所有人。用一种浪漫的说法，也许正是在密林深处，奈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远见近拾

北园书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怡帆译
《论幸福》

拿走那根别针

李北园

“现今外交官们的衬衫里总有根放错位置的别针，这导致欧洲局势的混乱。”

这不是哪位时政评论员的锐评，而是法国哲学家阿兰(1868—1951)的遣词造句。在哲学小散文《布塞法勒》里，阿兰提到一件事，当孩子哭闹不休时，照顾孩子的人常常会因此定义孩子的性格与好恶，甚至会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寻找遗传因素。而事实上，引起孩子哭闹的，往往是衣服里面一根放错位置的别针。在阿兰看来，小到个人情绪，大到国际时局，种种混乱的出现，往往源于不起眼的小事。身为哲学家和教育家的阿兰，试图找出并拿走那根放错了位置的“别针”。

《论幸福》是阿兰交出的方法论，在这本初版于1925年的书里，他引导读者通过具体的手段调整和平复情绪。阿兰相信“脾气的每个变化都来自短暂的心理事件，我们却扩大它，并赋予它神谕的意义。由此而生的各种脾气就开始制造不幸”，他强调“我所指的是那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理由可以导致自己深陷于不幸当中的人，因为这种人的不幸完全是自找的。对于真正的不幸，我不予置评，不过，我仍认为脾气会加重不幸的处境”。

《论幸福》初版时收录了60篇哲学千字文，后来再版时又不断调整，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共收录93篇。阿兰毫无疑问是哲学家中的行动派，他用文字拆解人们的情绪，《论幸福》里面的很多篇章直接以情绪名词为题，《恼火》《神经衰弱》《忧郁》《激情》《恐惧即病》《关于想象》《微笑》《希望》《关于宿命》《耐心》《好脾气》《别绝望》《瞎搅和》《辱骂》《烦闷》《采取行动》《幸福是美德》……可以说，阿兰对人类的每一种负面情绪，都对症开出了速效药方。就如同规训自己的脾气，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在《瞎搅和》里，他说：“无论如何，应当想尽办法安慰自己，而不是任由自己掉进悲惨的深渊里。那些一心想自我安慰的人，总是能比想象中更迅速地恢复正常。”在他看来，喉咙发痒、抓痒、失眠，这些即便看上去是因为身体不适带来的问题，其实也有情绪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要做的是放松心情，顺其自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辱骂》里，他指出应当把别人的咒骂当作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这些词语的发明纯粹是为了出气罢了，而不是为了刺伤或激怒别人……事实上，所有的辱骂都是胡说八道。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明白在辱骂里没有什么需要去理解的内容。”

阿兰言简意赅的剖析犹如禅宗所讲的当头棒喝，读来令人有种猝不及防的顿悟。这种直击命门的风格和阿兰的经历有一定关系。阿兰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毕业后在里昂等地教书。1903年起，阿兰开始为《里昂快报》撰写专栏文章，“用笔杆支持左翼党派的政策”。这些不足千字的小文章以高质量博得读者青睐，并于1908年汇集成册出版。之后阿兰回到巴黎，继续担任中学教师。他不顾当时的舆论，预言并谴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中，他志愿在炮兵服役，战后重返中学任职，直到退休。阿兰一生出版多部作品集，大都以文集小册子的形式呈现。在人心惶惶的动荡时代，阿兰推崇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他并不像笛卡尔那样要构建一个容纳宇宙的知识体系，他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注现实生活，一直努力用哲学思想观照人们的日常。这大抵是出于一位教育家的自觉与自愿。

阿兰有一位做兽医的父亲，这样的成长背景在他的写作当中有鲜明印记。《幸福论》里最轻松有趣的地方，就是用动物做比方。首篇《布塞法勒》就是用一匹马的名字为题。布塞法勒是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时期一匹有名的烈马，它让所有企图驯服它的马术师都摔了下来。亚历山大经过细致的观察，找到了那根让布塞法勒惊跳不已的“别针”——它惧怕自己的影子，当它面向太阳，把影子甩在身后，就会慢慢冷静和疲惫下来。由此，阿兰提出贯穿他一生的哲学思想——如果我们不知道激情的原因，我们便无法管理激情。激情正是让人们行为失衡的那根“别针”。

《幸福论》是阿兰思索的结晶，每一篇都展示对于现实生活中个体情绪问题的思考。他的推演和结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甚至可以说，离开了阿兰的推演，那根“别针”可能根本无从寻觅。但就像生活在17世纪的笛卡尔一样，阿兰展示的，是理性思考的行动如何实际发生，进而对管控个体的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所谓的理性思考，对于21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种缺失。我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按照阿兰的方法，一位普通人甚或一位外交官能找到那根“别针”，从一堆混乱中超脱而出，那么，“幸福论”的漏洞无关紧要。